



堅決支持社陣議員辭職行動

社會主義陣綫的九位“國會”議員，已經在十月八日正式向“國會”提呈了辭職書，從這一天開始，社陣已經同法西斯行動黨把持的“國會”一刀兩斷，再也不發生任何關係，所謂“國會”也由於社陣的這一英明果斷的行動而名存實亡。

今後，只要行動黨頑固不化，不肯接受社陣所提的合情合理的八項民主大選條件，不肯把民主權利交還人民，那麼，它就不能擺脫由於獨裁專政而陷入的困境，它就要一直死抱着一個沒有反對黨的“國會”，就像死守一具屍屍或一口棺材一樣。一個沒有反對黨的“國會”，這根本不像行動黨所鼓吹的西方“議會民主”。

關於社陣議員辭職的背景、理由，在社陣所發表的文告聲明中，已經非常詳盡、非常明確、非常雄辯地加以闡述了。我們人民黨作為社陣的兄弟黨，作為同社陣具有共同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反帝反殖政黨，堅決地、無保留的全力支持社陣的這一決策。我們也完全同意社陣對“議會民主”，議會鬥爭和今後群眾運動的觀點和政策。

社陣議員的集體辭職，是法西斯行動黨逼成的，是法西斯行動黨拼命壓制左翼，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剝奪反對黨議員的權利，實行暴戾統治的結果。如果要問什麼人不尊重“國會”，什麼人不尊重“議會民主”的話，那麼，首先獎指責的不是社陣，不是我們左翼人士，而是行動黨自己。像星洲“退出大馬”這樣一件關係新加坡的前途命運的重大事件，行動黨有沒有尊重“議會”，提到“議會”上去討論通過呢？沒有！一些人會說立法議院是民意機關，那麼，行動黨幾個寡頭做出退出“大馬”的決定而不必徵詢立法議會，這難道叫着尊重民意嗎？過去，有整整半年、九個月，甚至一年不開立法議會，有多少次經反對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開會

的要求，行動黨當局完全當作耳邊風，理也不理，請問，這叫着尊重“議會”，尊重“議會民主”，尊重反對黨嗎？再有，有幾位反對黨議員剛剛中選，還來不及到議院宣誓就職，就投入監獄關了整整三年，至今還不獲釋放，請問，這也叫尊重“一人一票”的選舉嗎？長期以來，反對黨的“國會”議員甚至連在自己的選區內召開群眾大會的權利都沒有（甚至在英國，這種權利是不可剝奪的），這難道也叫尊重反對黨嗎？這難道也叫做民主嗎？請行動黨的官老爺們以及替行動黨幫腔的先生們回答這些問題吧！

這樣的“國會民主”，拿去丟給狗，狗也是不會吃的。到底是誰不尊重“國會民主”，到底是誰怕誰，到底是誰玩弄，這不是昭然若揭了嗎？怎麼能怪社陣抵制“國會”和議員辭職呢？任何一個思想健全的人，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都會同情和支持社陣所採取的這一完全正當而必要的行動的，都會把矛頭對準法西斯行動黨的。不明真相的人很快就會醒悟過來的。

我們早已聲明，「左翼參加不参加議會選舉，那就要看行動黨政府尊重不尊重民主，開放還是不開放人民的出版、言論和結社自由，保障不保障反對黨議員的人身自由和應享有的權利。如果行動黨政府繼續動不動引用“公安法令”無理拘捕反對黨人員和民主人士，如果行動黨不肯釋放左翼人士、左翼領導人和反對黨議員，如果行動黨繼續壓制人民的出版、言論和結社自由，如果人民選出的議員可以任意加以拘捕，那麼，誰要參加這樣臭的選舉呢？誰還能對這種“議會民主”具有信心呢？」（見本報第八期社論）這里，我們重申這個基本態度。如果行動黨還大言不慚地自稱“民主”的話，就請來個公平民主（按社陣提出的八大條件）的大選吧！



續上期

關於新加坡經濟的幾個問題

進展緩慢的“工業化”政策

“工業化”，這是行動黨喊得十分響亮的口號。行動黨吹噓它的“工業化”政策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可以使星加坡“獨立生存”，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按李光耀的說法，新加坡每年有三萬多青年出來社會找工作。而行動黨的“工業化”政策搞了整整五年，提供的職業還不到一萬個（截至目前，新加坡“新興工業”數目為九十三家，僱傭工人九千多）。請問，要依靠這樣的“工業化”政策來解決失業問題，豈不是杯水車薪嗎？

行動黨的“工業化”政策能使新加坡“獨立生存”嗎？答曰：不能。理由是這種“工業化”其實是給外國（主要是英國、美國和日本）壟斷資本控制新加坡的經濟命脈提供方便。請看以下的事實與數字：

在已經投入生產和設計中的“新興工業”共有一百四十四家，其中一百〇七家全部屬外國資本，或外國資本佔大多數。這一百多家外國資本經營的工廠企業，資金雄厚，規模宏大，有錢都給他們賺去，本地民族資本在得不到扶助的情況下，很難與之競爭。

先後在星洲投資設廠的日本大企業，包括富士鋼鐵公司、日本鋼管廠、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業株式會社等。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美孚系統的一家石油公司莫比煉油公司，也已在星洲建立一家煉油廠，投資額達四千萬叻元。行動黨政府對於美國壟斷資本更是另眼相看，特別優待。今年三月，行動黨政府同美國政府簽訂了“投資保證協定”，給予美國在新加坡進行投資種種特權，如凡徵用或沒收美國在新加坡的商行、工廠企業時，新加坡政府保證賠償美國資本的損失。甚至由於戰爭或社會動亂而使美國資產遭到破壞，新加坡政府也負責賠償。這個協定之簽署，無疑給美國控制新加坡的經濟鋪平道路。

當然，英國也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新加坡的長期的經濟控制，它在不斷增加在新加坡的投資。如壳牌石油公司為要利用新加坡作為一個倉庫從而供應更廣大的地區，今年又在新加坡的毛廣島再建立一座煉油廠，投資五千萬叻元（一百七十八萬英鎊），預計於明年完工。該廠建成後，壳牌石油公司在新加坡的投資總達一億叻元，而每年的提煉能力從二百萬噸增至五百萬噸。

行動黨政府發展工業，走的不是新興國家的以建立本民族的經濟為目標的道路，而是開放大門，讓外國壟斷資本家像潮水一樣湧進來，讓外國壟斷資本控

制新加坡的經濟命脈。這點，行動黨的“工業化”政策與聯盟政府的“工業化”政策是一模一樣的。

行動黨政府不僅鼓勵英、美、日向新加坡大量進行資本輸出，而且還以政府“經濟發展局”的名堂同外資合股開廠。在“新興工業”的一些法案與條例底下，外國資本以“新興工業”名義在新加坡開廠，可以享受種種優待和特權。如自投入生產後的五年內，完全免徵所得稅；進口機器，免徵進口稅；給予關稅保護；所有政府部門均予優待先採購所謂“新興工業”的產品；“經濟發展局”還可以提供中期或長期貸款，或購買其股票，成為股東之一；此外，還有自由移動資金，自由將盈利匯回本國等等。

尤有進者，財政部長林金山於去年十一月宣佈了一些措施，旨在進一步吸引外國資本的湧入。這些措施主要是（一）加速折舊率，允在三年內完全地把投資勾銷掉。（二）對於“本地”廠商，由於旅行、市場推廣、廣告及免費樣品的海外開支的免稅額增加一倍，由於促進出口而在海外所支出的每一叻元，廠商可以要求減低納稅兩叻元作費用；（三）對在本地的廣告所增加的支出加倍減低納稅，明年（即一九六六年）開始，在廣告方面比前一年支出較多的本地廠商，可以要求對這些增加的支出加倍減低納稅。

行動黨政府原來是希望每年通過“發展工業”創造一萬二千個就業機會，並且開闢四千萬美元的出只市場。但是，“工業化”搞了整整五年，創造的就業機會只不過一萬個，即令今後能每年創造一萬二千個就業機會吧，然而，新加坡每年有三萬多人找工作（主要是從中學、高等學校畢業出來的青年），區區一萬個職位遠遠不能解決就業問題。每年仍有二萬多人要失業的，可見問題之嚴重性。

衆所週知，發展工業需要解決資金、原料、勞動力（包括技術人員）、市場等一系列問題。有些新興國家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呢？資金，它們主要是依靠內部積累，靠國內人民的勤奮和創造勞動，當然也接受外國援助，但外援是鋪而不是主，外國資本受嚴重節制，使之不能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對於一些真誠要協助自己發展民族經濟的友好國家的技術援助，是接受並且歡迎的。至於市場，則主要依靠鞏固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同外國貿易，互通有無。

（轉入第三版）

(接目第二版)

行動黨政府的所謂“工業化”政策，走的是同一般新興國家根本相反的道路，它不是走自力更生，發展民族經濟的道路，而是實行種種措施，以導致新加坡受美、英帝國主義更加嚴密的控制。這樣的“工業化”，實際上不能造福人民，而是給外國壟斷資本提供發財致富的良機，並使新加坡工人受外國壟斷資本的殊酷沉重壓迫和剝削。更何況新加坡在被爲人地同

聯邦分離的情況下，發展工業所不可缺的原料以及市場問題，都極其困難解決，“工業化”進展有如烏龜爬，慢極了，而且又是半空吊，前景並不光明。中華總商會會長孫炳炎先生的一段話，應該可以代表相當多工商界人士的看法，孫先生說：實際上，新加坡的工業，幼芽雖已吐露，然而距離理想的目標却還遙遠。”（見孫炳炎發表於各報上的一篇文章“貿易與工業並重”）這多少反映了本地資本家對新加坡“工業化”的信心不足。

財政開支增加，向人民抽稅也增多

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之後，財政開支大大地增加了。據統計，一九六四年新加坡政府財政預算支出爲3.264億叻元，一九六五年預算開支據增爲3.598億叻元，而今年，政府預算開支據增爲5.366億叻元。即增加了將近二億叻元，爲數不小。這裏，還不包括所謂“發展開支”呢。而“發展開支”也者，主要是國防與治安的發展開支，簡言之，就是招兵買馬用的錢，數目非常龐大。行動黨政府今年制訂的一九六六年——一九七〇年的五年發展計劃，其開支預算爲15.21億叻元，平均每年開支增加了3.07億叻元。

財政開支大增，錢從何處來呢？當然天空是掉不下來的，要增加收入，行動黨政府的辦法就是增稅，拖延公務員的晉級擢升，以及靠建屋子出租和多關收費的停車場等。據新加坡關稅局發表，今年前五個月的稅收總額爲7,493萬叻元，比去年同期的6,307萬叻元增加了1,186萬叻元。其中增收最多者是保護稅，共增加了3587.6萬叻元。由於保護關稅的增多，使新加坡賴於維持經濟活動的轉口貿易地位進一步被削弱。行動黨的經濟政策正日益陷入一種矛盾的局面，而越來越難解脫，即一方面“工業化”進展緩慢（目前新加坡總產值約只有一億五千

多叻元），工業無法成爲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而另一方面，傳統的自由貿易的範圍則一天天縮小，一向被視爲轉口綫的轉口貿易正遭到越來越嚴重的損害。這種青黃不接的局面將越來越惡化，將給新加坡的經濟造成大動盪與嚴重的危機。

最近一些日子，李光耀一伙人在演說、談話中都不斷呼喚人民“愛國”，要“刻苦”，要“犧牲”，除了請請大家勒緊袴帶”這句話沒有講以外，什麼話都講了。李光耀一伙人的葫蘆里賣什麼膏藥，明眼人是可以一眼看穿的。這就是說，新加坡的地位非常不穩，行動黨政府對於經濟前景感到恐懼和不安，因此要工人忍受失業、半失業的威脅，要工會不去發動工人起來鬥爭與反抗，鼓勵老板加緊壓榨工人階級，以補償他們在經濟衰退時期的損失。

如果目前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那末，行動黨政府肯定會加緊向人民搜刮和壓榨的。除了準備取消超時工作“雙薪制”、假期工作“三薪制”之外，還可能增加物品的購買稅，門牌稅和別的課稅。所有這些措施，勢必加重廣大市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的負擔，激起人民群眾的不滿和反抗。行動黨執政下的假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將人民帶來些什麼惡果，人民群眾將越看越清楚。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這是唯一出路

我們左翼早在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時就指出，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玩弄的新加坡的虛假獨立，絕不會給新加坡人民帶來繁榮和幸福。我們一再強調，新加坡是馬來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正如手和腳不能脫離人體而獨立一樣，新加坡也不能脫離馬來亞而獨立，如果硬要脫離，其結果不是真獨立，而是假獨立，不是永遠生存，而是走進死巷。今後局勢的發展，特別是經濟問題的日益尖銳化，必將不斷地證明左翼分析正確。即使是現在，也有很多曾經歡迎“獨立”的工商界人士、小販、公務人員以及其他人士，對行動黨執政下的假獨立的新加坡感到迷茫、彷徨和失望。

目前，一般群眾的心理是：假獨立是不好的，新

加坡確實很難獨立生存下去，但要“合併”回到“馬來西亞”去，這就等於自投羅網，聯盟政權的暴戾統治、“馬來西亞”的苦頭，他們都吃夠了，不願再吃了。竟應該何去何從呢？

請大家想一想：新加坡是不能獨立的，是非同聯邦統一起來不可的，但爲什麼目前新加坡和聯邦實行統一，仍然會帶來災難呢？根源就在於聯邦是處於阿都拉曼集團的暴戾統治之下，人民群眾受着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的壓迫，而新加坡又仍然處於親帝國主義的法西斯行動黨的專制統治。如果我們把帝國主義趕出馬來亞（包括星加坡），把反動的阿都拉曼集團和李光耀集團一齊打倒，成立真

(轉入第五版)

哲學知識

理論是指導實踐的指南



•馬哲•

我們左翼隊伍里之所以存有輕視理論、對理論產生反感和偏見的印象，其原因是非常多的，情況也相當複雜，不容易每種都讀到，以下只就比較普遍見到的幾種情況，提出一些意見，希望引起注意而自行檢討和糾正：

一、有些抱着事務主義觀點的人認為理論很枯燥、乏味，很難學，於是就認為只要把實際工作做好就行，不一定要學理論，反正同樣是為群眾工作、為革命服務。

抱着這樣想法的人，在我們隊伍里是最多的、最普遍的，也是起着極壞影響、害處最大的。當然，在一個革命運動里，在群眾工作上都是為了革命、為了人民群眾，而且這些人如果是真正踏實地、勤奮地為群眾做實際工作的話，而不是虛假的、裝腔作勢的、說白話的，那麼他們的經驗一定是很豐富的，是應珍惜的。但是，這些抱着單純實際工作觀點的人顯然是忘記了或忽略了，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群眾運動，不外都是為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這就是為了要推翻舊社會、舊制度，建立新社會、新制度，這樣我們就不得不講究效果，講究速度。在效果上，就是越能避免犧牲、避免損失越好；在速度上，就是越快推翻舊制度舊社會，越快建立新制度新社會越好。從這個要求出發，如果我們所有參與鬥爭的成員，一個個都是土頭土腦的，只有實際工作經驗，却毫無理論知識作為支柱，那一定不能夠突出政治，逢事不論大小輕重，有些自己本來是可以自覺解決的，也要依靠領導方面親自一點不漏地指出才能做到，有時還要經過多方面反復解釋才能明白，一旦失去了依靠（鬥爭進入激烈階段，在一些局部的、個別的工作上是往往會發生的），自己就變得像一堆廢物、一塊木頭，無能為力，試想，這不是嚴重地影響到鬥爭的進程嗎？當然就達不到上述的

好效果、快速的要求了。因為，經驗這東西，根本上是感性認識的東西，或者說是局部的知識，和理論認識比起來是有着本質上的差別的，其中感性認識正是還少了一段深化、判斷、推理的重要過程，也就是說，一個人在實際工作中能夠得到豐富的經驗，但是

這經驗還沒有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理的製作改造工夫，這經驗就還沒有提到理性的認識階段。因此，一個人只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儘管他的經驗非常豐富，在社會鬥爭中，也不能算是達到了要求，還不能就此滿足的，他還必須積極從事理論學習，讓經驗和理論相結合，使自己的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性認識階段，這經驗才能變為活的、有用的。有了這樣豐富的經驗，也掌握了一定的理論知識，才算是具備了比較完全的知識和比較普遍的認識，在革命鬥爭中，群眾運動中，就一定有卓越的表現，可以很快的而又在很少犧牲、很少損失的情形下打倒舊社會制度，達到革命的好政策、快速度的要求。同時，一個毫無理性認識的人，他的政治認識一定很低的，那麼，要他做好實際工作也是很困難的：首先，他就不懂得分析工作的性質，找不出加速完成工作的規律，只能刻板後事，一味硬碰、死套、蠻撞；其次，因為缺乏理論知識，思路就不能廣闊、死開朗、不靈活，遇到困難無法排除，只有加重工作的困難，却不能減輕工作的負擔。

三、有一些人，他們理論學得很少，但他們對待工作很有幹勁，很積極，肯深入群眾，一路來也作出了一些成績，在群眾間進行了一定的作用，這樣就使他們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不必學理論也能把工作做好，於是就不想學理論。

抱着這一種看法不學理論的人，主要是因為他們看到一面，而且是非常次要的一面，却忽略了問題的根本方面，也就是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更加證明了他們不學理論的可悲之處。他們不知道，他們之能夠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績，取得一點成就。並不完全是他們自覺地根據規律或者任何自認為正確的思想方法進行分析所取得的，因為他們既然沒有可靠的理論知識，就自然很缺乏這樣自覺能力和分析物的思想方法，而他們能夠做出一些成績，很明顯地只能夠說明是領導方面的指示正確，另一方面是因為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支持的結果。例如，一般真正左翼的政黨或團體，它們的方針、政策都是非常正確的、具有高度的科學預見性的；當鬥爭起了變化，轉入新的形勢，領導方面一定會又有新的指示，指出一定階段內的中心任務，並貫徹到全體成員中去。因此，我們按照着這總的鬥爭方向和當前鬥爭的中心任務的原則為指導，去進行工作，把工作做好，完成任務，又有什麼可以值得驕傲的呢？又有什麼理由可以滿足而認為不學理論也可以呢？任務不能完成，或者工作做得不好，做不出成績，那才是嚴重的呢？

三、有些不踏實的人，學了一點理論，就愛到處賣弄，向人吹噓，一旦碰到實際問題，却無法把掌理論聯系到實際中去，指導鬥爭、解決問題，這不但挫了他學習理論的銳氣，也會使其他人產生一種錯覺，

（轉入第五版）

(接目第四版)

以為理論並不一定能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便覺得學習理論也沒有什麼作用。

不踏實，愛出風頭，不懂裝懂的人，總有一天是會碰到難堪局面的，要不然也一定不會有好結果，吃虧的是自己。出風頭如果是他個人的事，不關到其他人、影響到其他人那是不要緊的，但像學理論這個問題，就往往會對其他人產生極惡劣的、不良的影響，帶來很可悲的後果。我們應該這樣來認識問題：即那些學了一點理論就呱呱叫的人，却不會把理論運用到實工作中去，運用理論知識來分析問題，指導工作，只能說明他們並沒有學好理論，對理論的掌握還不夠，却絕對不是理論沒有什麼作用。一個真正稱得上把理論學到手的人，他一定會掌握理論的精神實質，懂得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在群眾工作中、革命實踐中或甚至日常生活中，他都能够利用理論來分析問題、指導鬥爭、解決困難，完全可以達到理論指導實踐的目的，卓越地發揮理論的作用，却絕不會隨便拿理論炫耀，嚇唬人，這就是其學好理論和假學好理論的分野。同時，正確的理論本身，就是最優秀的、科學的思想教科書，具有無比強大的感化力，一個真正鑽研過理論（在和實踐統一的基礎上）、學好理論的人，理論已經給了他重大的、寶貴的、最優秀的思想教育了，他一定只有變得更認真、會踏實，當然不會隨便賣弄自己之所長，大搞風頭主義；只有那些沒有學好理論；沒有真正領會到理論中蘊藏着的深刻的思想教育的人，只有那些只會背誦一兩個理論述語、一兩個句子的人，只有那些不懂裝懂的人，才會變得輕浮，更不踏實，更愛出風頭。這類人是到處都有的；任何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或者自己身邊的同志、朋友之中，就都可以找到，鑑別得出來。

四 有一些游離分子，對工作本來就缺乏積極性，更沒有學習理論的心思。

我們左翼隊伍中，這類游離分子是很多的，尤其是當鬥爭遇上困難或運動陷入低潮時，這類人就更多，往往自己浮上來給人們辯認。這類人中，有不少是十足的投機份子，抱着機會主義思想到左翼裏來，他們可能是聽人家說過，或者過去從書本上似懂非懂地讀到了有關進步力量最後必定取得勝利的話，便急急忙忙也插一隻腳到左翼裏來，裝出一副左翼的樣子，等待時機，期望在左翼勝利的时候可以從中沾一點便宜；萬一左翼失敗了，或遇上什麼大災難，他們也很容易可以推脫，甚至可以搖身一變，投靠到反動派一邊去，那是不足怪的。這類人當然是非常輕視理論的，除了有時要偽裝一下，顯示自己，否則絕不會去學習進步理論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其中也有一部份是認識不夠的，由於看不清革命鬥爭的前途，不懂得群眾工作的意義，沒有人開導，自申散漫的作風很嚴重，由於這樣自然也不會在實際工作中學習理論。

這些人却是可以團結，可以教育的。詢他們先從實際工作中總結自己的經驗開始，然後有意識地指點他們，讓他們知道理論可以指導實踐，開導他們的興趣和知慧，他們不但會對實際工作越來越積極，對理論的學習也必定會越來越重視，那是毫無疑問的。

以上就是我們對左翼隊伍裏存有着的各種不同的輕視理論學習，或對理論產生偏見和反感的原因和情況。這種種原因和情況，都不是只在某一段時間，某一個組織或某一個人身上發生的，而是長期以來傳統性地存在於左翼內部的。要根除這種偏差態度，必須先有效地開展思想教育運動和思想鬥爭，開始指出了理論指導實踐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然後才能逐步引導他們向理論方面發展，學習理論，逐步提高理論水平。

當然，我們這裏只是就理論對於革命實踐活動的指導意義這一點來說明，目的是為了說明在實踐工作中學好理論的重要性，並不是認為理論可以超越實踐，或者不必參加實踐工作和甚至放棄實際工作，只要學得空空洞洞的理論就夠了，如果這樣理解的話，那就完全錯了。相反的，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反復多次指出的，理論是從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的，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經驗總結；理論對實踐存在着依賴關係，沒有實踐，就沒有理論。因此，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家們，總是把實踐放在第一位的，以為實踐高於理論，理論離開實踐將無從產生；同時，理論正確與否，也還得經過實踐來檢驗才能證明。這不但有定實踐的重要性，也說明了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原則與緊密聯系的重要意義。

(下期續完)

編者按：「理論是指導實踐的指南」一文，上期會有多處打錯字和打漏字，現在將一些比較重要的錯處校正如下：

1. 第一版第四段中的「普遍幹部」、「普遍成員」，實為：「普通幹部」、「普通成員」之誤；

2. 第二版第二台第九行中「全體的」三字頓號後面漏了「本質的」三個字，全局應為：「才真正達到了事務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系的各個方面」。

(接目第三版)

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實行各民族大團結的政策，發展民族經濟，剷除封建勢力，使“耕者有其田”，通過人民政府大力開發我國的豐富天然資源，舉國上下意氣風發，建設國家，那時，我們不是可以過幸福、自由的生活了嗎？

因此，我們全馬人民必須不分民族、不分階層，不分宗教信仰，團結一致，進行堅決的鬥爭，打倒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阿都拉曼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從而建立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繁榮、富強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

(全文完)



“議會民主”經已死亡！

全力支持社陣議員辭職行動

我黨於本月九日針對社陣全體議員辭去“國會”議席事，發表聲明，全文如下：

社陣全體議員於本月八日集體辭去“國會”議席，這是我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及一切反動派的鬥爭史上，創下了新的一頁。它說明地指出了我國反帝鬥爭的忠誠人民與狡猾的敵人劃清了明顯的界綫。這是誠心誠意為爭取一個進步的、民主的人民與那些以法西斯手段來鎮壓和壓迫我國人民的鬥爭；也是我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的罪惡與那些維護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的利益的鬥爭；同時，也是我國人民為爭取實現一個民族解放與帝國主義之民族鎮壓之鬥爭。

行動黨反動政權屬於鎮壓人民的一個集團。行動黨傀儡政權，過去與現在都在進行慘酷鎮壓人民，這充份地證明了帝國主義（尤其是美英帝國主義）的同謀者。它濫用了新加坡的“國會”，鎮壓與欺騙人民，以期延續反動集團的統治。

社陣是誠心誠意為人民之利益與福利而服務的。它拒絕了被捲入集體欺騙人民之計劃，並且為着進一步徹底地暴露反行動政權統治下之虛偽的、死亡了的“議會民主”，已經正確地抵制與辭去“國會”議席。

左翼議員之集體辭去新加坡“國會”議席，乃增加了東南亞乃至全世界之反帝力量，同時地刺激了人民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及本地區的李光耀、阿都拉曼集團。左翼議員之辭去“國會”，完全暴露了所謂“獨立的新加坡”是虛假的，是美英帝國主義為了繼續維持其“分而治之”之願望。所謂新加坡“國會”，實際上是一個樹膠印，給反動的行動黨傀儡政權利用來欺騙與鎮壓人民而已。所謂“國會民主”是一個鬧劇。此點已消除了人民對行動黨傀儡政權存有民主之幻想，同時也暴露了行動黨領導人之法西斯真面目。

事實已證明了所謂新加坡“國會”是行動黨反動政權的一個工具與樹膠印，企圖通過它來欺騙與鎮

壓人民而已。在一九六五年前後之當時的“立法議院”與現在之“國會”所發生之一系列事情斷然地證明了此點。這些事關人民生活之重大問題，例如：“新加坡獨立”（？）、“新加坡憲法”、“貨幣分家”等等，都在“國會”以外所決定。“國會”僅被反動的行動黨傀儡政權利用來制定預想的法令來恐嚇人民，“國會”僅用作樹膠印來實現其願望。以社陣為首的反對黨對此重大問題從未被徵詢意見。尤有進者，反動的行動黨政權於一九六三年九月之大選後，即將一部份之中選之社陣議員橫蠻無理地逮捕。所謂“國會”，只利用來通過一系列鎮壓性的反人民的法令！例如：“更換居民證”、“小販德士執照”與苛待非公民之法令，例如：“工作准證”、“非公民子女之學費、進口固打與關稅限制”、“工業關係法令”、“職工會法令”、反帝愛國志士未經審訊被強蠻拘留等等。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前後之一系列事件，都證明了新加坡“國會”是行動黨的一個工具與樹膠印而

已。它實質上是李光耀傀儡集團用它做為中產階級及其寵兒閒談的地方，哄騙與鎮壓人民！它是資本主義“議會民主”之“寮所”。

人民黨基於上述之分析而達致結論；認為目前之“立法”機關，是由中產階級之行動黨政權所控制。若是製造幻想騙人民去支持一個中產階級之“議會民主”，目前局勢表明社會主義、進步的、民族解放運動之力量已大大超過帝國主義與各國反動派。我國鬥爭經驗已明確地告訴我們重視此結論。人民黨全力支持兄弟黨社陣之辭去新加坡“國會”之正確鬥爭路綫及其正確的與合理的基於八大條件之要求，舉行一個公平的與民主的大選。我們全力支持基於團結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與本地的一切反動派，為完成實現一個統一、民主與真正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日本左藤政府——美帝的走卒

隨着美帝國主義反革命“全球戰略”重點東移，日本在美帝國主義戰略計劃中的地位就顯得更重要了。實際上，美國已經把日本變成它在遠東的最大後勤基地和重要的侵略跳板，而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加緊復活，準備充當美帝侵華侵朝和侵略整個亞洲的打手。

日本佐藤政府是代表復活中的軍國主義勢力的政府，它一方面將“美日安全基本條約”（這是將日本置於美國控制下的條約）繼續下去，並在美國的扶持下加緊擴軍備戰，一方面則積極充當美帝侵略越南的走卒。

親美聯蘇反華，這是佐藤政府對外政策的核心。美帝國主義要利用日本充當打手，實行“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政策，蘇聯修正主義也要利用日本來“孤立”中國，而日本軍國主義則要賴美國的扶持才能加速東山再起，稱霸亞洲，既要稱霸亞洲，就自然把亞洲的巨人中國看成頭號對手，因此也需要同蘇聯修正主義勾勾搭搭，妄圖孤立中國。美帝、蘇修和日本反動派儘管各有各的打算，各懷鬼胎，但他們在反華，反對亞洲革命這點上是一致的。實際上，他們已經組成了美—日—蘇的反華反革命“神聖同盟”。

今年七月底，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問了日本，同佐藤以及他的外長椎名悅三郎一齊研究了如何協助美國搞“和談”騙局以出賣越南的問題，也研究了如何孤立人民中國的問題，還研究了進一步密切蘇日合作的問題。他們達成協議：今後兩國的部長級官員將定期舉行會議，以便更好地合作與互通情報。就在葛羅米柯訪問日本之後不久，佐藤就一反過去的決定，宣佈拒絕中國代表團入境日本以出席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並拒絕發出護照給打算到中國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日本青年。

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復活的情況，更是值得注意。目前，日本的“自衛隊”總兵力已達廿七萬餘人，其中包括了導彈部隊，擁有能裝核彈頭的準式導彈。

今年開始了日本的第三個五年擴軍計劃。計劃的重點在於發展核武器。在日本學校、機關和文化領域，宣揚軍國主義思想的教科書、書刊雜誌、電影等空前大泛濫。此外，日本佐藤拉攏南朝鮮朴正熙集團和台灣蔣匪幫，力圖實現拼湊“東北亞軍事同盟”的罪惡計

劃。“日韓條約”的簽定，表明日本軍國主義已在南朝鮮取了立腳點。日本的“防衛廳”（即國防部）所擬定的密秘作戰“三矢計劃”與“飛龍計劃”，更是以中國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作為“想敵”，企圖在美國的指揮與配合下進攻北朝鮮和中國。

以佐藤為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野心勃勃，念念不忘他們的“東南亞共榮圈”的昔日美夢，力圖向東南亞實行擴張。今年四月初，由美國策劃，日本出面主持的“東南亞開發部長會議”，就是日本向東南亞實行擴張政策的露骨表現。出席這個所謂“開發”會議的大多數是美國的走狗和奴僕（如泰國、菲律賓、南越傀儡政權），自稱為“獨立”的星加坡行動黨政府，也派了財政部長林金山出席會議，擠身於美國的走卒和傀儡之間。

佐藤政府選特別賣命地充當美帝侵略越南的走卒和幫兇。它提供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日本土地給美國做侵略基地。日本的所有優良軍港（如橫須賀、佐世保等）都被美國海軍佔用。當去年二月，約翰遜政府下令擴大侵越戰爭，大舉轟炸越南北方時，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竟公開替美國辯護，胡說什麼美國的行動是爲了“自衛”，他還叫囂，日本正在“等待時機”，“一旦接到請求”，“什麼事都願意幹”。真是狂妄到極點。

日本目前已變成美國的一座大兵工廠和總後勤基地。日本的壟斷資本替美國生產侵越戰爭用的大量物資（包括彈藥、食品、軍服、藥品、汽油彈、化學毒藥等），日本的許多工廠還專門替美國修理在越南打壞的飛機、艦隻等。去年，美國政府暗中向日本訂購四十萬個塑料屍體袋、消息漏出，舉世轟動。除此之外，美國還大量僱傭日本的技師和醫務人員，把他們騙到南越去替美軍做修理與醫療工作。美軍設在日本的醫院，幾乎全部被用來治療從南越運來的美國傷兵。

佐藤政府在政治上也不斷為美國侵越政策效勞。今年年初，當約翰遜拋出了“十四點計劃”，搞了個規模空前的“和談”騙局時，佐藤政府馬上出來拍手叫好，極力捧場，還派了外相椎名悅三郎去蘇聯推動“和談”。今年八月，當泰國提出召開所謂“亞洲會議”以促“越戰和解”時，佐藤馬上表示歡迎，並且答應扮演要角。總之，佐藤政府一直是跟着美帝的笛聲起舞的。它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個可恥的走卒。

佐藤政府如此死心塌地的為美帝效勞，滿以為已經從中撈到什麼好處，殊不知美帝的侵越戰爭政局已定，現在是“死馬當活馬醫”，美帝在亞洲的地位正在動搖，像佐藤政府這樣倒行逆施，到頭來必落得個為美帝陪葬的結局！



再論造謠

• 尚武 •

我們上期論述了反動派為什麼要造謠，現在來剖析反動派是怎樣造謠的。識破了反動派造謠所使的慣技，就不難找到粉碎謠言的辦法。

目前，美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及他們的追隨者，都在開動他們的全部宣傳機器（報章、廣播電台、通訊社等），瘋狂地咒罵中國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使盡了所有造謠的方法，力圖把中國說成一片漆黑，一片混亂。現在，我們研究他們的造謠技倆，正可以拿他們如何咒罵與詆毀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為例。

反動派造謠的技倆可歸納為以下幾種：

第一、誇張法，或曰“加鹽加醬法”——事情本來不是那麼嚴重，硬說成非常嚴重，有幾隻蒼蠅碰壁，就硬說是廣大人民遭殃，湖上起了漣漪，就硬說是“掀起了驚濤駭浪”，有幾個資產階級“學者”、“權威”被打倒，就硬說中國“整肅知識份子”。原來，造謠者是把一小撮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做全中國知識份子的“代表”。這一小撮人被批判，說成了“中國知識份子都被批判”。

又如，中國報章說，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遇到來自反革命方向的阻力。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是，經造謠者的加鹽加醬，就變成了“中共承認，文化大革命遇到了嚴重阻力”。“中國文化大革命已被阻遏”等等。請看，這是多麼惡毒的歪曲！這班小腸比蛇毒還毒的造謠者，惟恐中國不亂，明明不亂，也硬說“大亂”。他們戴着黑色眼鏡看中國文化大革命，拿着放大鏡看中國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的暫時的缺點，因此，他們把中國的前途說成倒退，把中國的革命說成混亂。他們狗嘴里長不出象牙來！

第二、神經過敏——根據主觀的願望，懷着險惡的居心，胡亂猜測中國的動向。比如，毛澤東很久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了，造謠者胡

思亂想，神經過敏地大叫“毛澤東病危了”，“甚至說“毛澤東死了”。後來，經事實證明毛澤東不但沒有逝世，而且十分健康。然而謠言已造，如何自圓其說呢？這些卑劣的造謠者竟無恥地說：“現在這個毛澤東，可能是替身，真的已經死了”。試問，如果毛澤東已逝世，而由別人當替身，那末，中國領導人豈不是在欺騙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嗎？這種造謠與圓謊技倆，簡直卑劣無恥到了極點。造謠者總是使自己陷於矛盾之中而無法解脫的，他們越是自圓其說，就越是暴露自己的造謠者的面目。

還有一種因神經過敏而造的謠言，造謠者發現毛澤東出席群眾大會一直不發表演說，就如同發現了什麼寶貝似的，造謠說：“毛澤東喉嚨有毛病”、只說“有毛病”，有些造謠者還不甘心，他們還畫蛇添足，說是得了“喉癌”。總之，毛澤東還活着，他們就挖空心思，硬說人家“生病”，“病危”，“死了”。

從這些歇斯底里，語無倫次的謠言中，我們不難看出，世界上的大小牛鬼蛇神怕毛澤東怕得要命，一提到“毛澤東”，這三個字他們就發抖。在赫魯雪夫當政時，那班牛鬼蛇神却不造這個政治小丑的謠，從不說他什麼“病危”“死了”“現在這個是替身”之類。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革命份子吹捧為“英雄”、“志士”、“受害者”，把革命認錯為“暴徒”、“摧殘文化”，把關係國家人民前途命運的大事說成是“權力鬥爭”、“內鬨”等等。比如明明有三個暗藏的反革命份子被中國人民發覺了，他們慌忙逃到香港，而新加坡某報却造謠說有三個“中共

高級幹部”逃出大陸。又如廣州紅衛兵搜查到一個暗藏的蔣幫特務時，發現了槍枝、偽鈔、金條等，由於義憤而打爛了這個蔣特務家里的一些東西，而新加坡某報章竟說紅衛兵“動手打人”、“橫行霸道”。

以上三種造謠法，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實、片面地報導、強調、誇張局部的、非主要的方面，而故意掩蓋主要的、全局的方面，給人們造成錯覺。

還有第四種造謠法，叫做“無中生有”，這是所有造謠法中最拙劣的一種。比如什麼“彭真自殺”啦、“羅瑞卿自殺”啦、某著名電影演員“被處決”啦，“工人同紅衛兵衝突”啦等等。這些謠言完完全全虛構的，一點事實根據也沒有，因此，也提不出一點佐證。這班心腸毒辣的造謠者，由於對革命的造謠和中國人民懷着刻骨的仇恨，由於對中國這個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巨人感到無限恐懼，他們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最惡毒的言語咒罵中國。對於這一小撮反動份子，我們就是找遍了所有的詞典，也沒法找到適當的詞語來形容他們人格的卑劣。

